谁更被接受？疫情背景下守法与遵规行为选择评价

孙红日　田建池　谢丽红

（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昌，330031）

摘要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爆发期间，以父母是否选择上报重点疫区归家儿子接受隔离为实验材料，探讨法律规定与社会压力冲突情境下行为选择评价。结果发现：1）相比于遵从社会压力行为，评价者对遵守法律规定行为的接受度更高、感知选择时的心理冲突更低、给予的行政处罚更低，疫情后的亲子关系变的更好；2）行为结果对评价影响受行为选择调节与评价问题有关，对接受度评价和亲子关系变化评价的影响显著受行为选择调节，而对感知选择时心理冲突评价和给予行政处罚评价的影响受行为选择调节不明显。可从规范聚焦和服从的情境及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理解行为选择对评价的作用及不同评价问题对应由心理状态、行为及行为结果三者所构成的不同模式角度理解行为选择对行为结果作用的调节效应。

关键词 遵守法律规定；遵从社会压力；疫情背景；他人行为评价；个人规范

临近 2020 年春节，突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我国各级政府纷纷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乙类传染病，甲类管理”一级响应，并依据本次疫情的流行病特点和《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等相关法律规定，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紧急预案。其中，“隔离”是预案中普遍采用的缓解和控制疫情扩散的一种手段。但是，这一措施严重地干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秩序，改变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和习惯，因此了解和掌握这一背景下普通大众对隔离措施的心理反应对防疫战疫具有重要意义。

从大众角度来看，隔离涉及多种利益协调。遵守隔离规定，不仅可防止自己被传染、免于因违法而受责罚，而且还可在一定程度上切断病毒传播，有利国家和政府的疫情防控。但是，遵守隔离规定也可能带来损失，如要忍受“有家不能回”、“亲人不能团聚”、“朋友不能相聚”的人际关系隔离，上报自己旅住重点疫区史可能带来潜在的社会歧视，拒绝或上报重点疫区来客可能面临潜在的社会压力等。因此，对于普通大众，在某种情境中选择是否遵守隔离的法律规定实质是衡量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过程。本研究选取父母是否上报

重点疫区归家儿子这一事件，考察人们在疫情背景下对法律规定和社会压力冲突情境下行为选择的社会评价，以了解人们在面临类似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时，对国家和政府相应法律措施的心理反应，为调动民众应对危机的策略制定与实施提供理论参考。

1 规范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疫情是一种社会公共危机。面对这一危机，民众个体对国家和政府相应法律规定的支持，可为疫情的缓解与控制提供群众基础，可直接降低社会损失和抗疫成本，因此遵守法律规定可看作是一种亲社会行为。在亲社会行为研究中，计划行为理论被广泛用于解释和预测行为。该理论认为，行为倾向是人们尝试做出某种行为的努力，它是决定行为的关键因素（Ajzen，1985；Ajzen，1991）；而个体感知推动他是否做出某种行为的社会压力，即主观规范，是影响行为倾向的三个主要因素之一。早期，人们认为社会规范的压力主要来自群体中重要他人，如亲人、朋友、熟人等。元分析发现，在计划行为理论框架下干预主观规范变量可成功改变行为，效应大小为 0.14（Steinmetz, Knappstein, Ajzen, Schmidt, & Kabst, 2016）。Cialdini, Kallgren 和 Reno (1991)认为，社会规范的压力除了来自群体中重要他人以外，还可来自群体中他人的典型行为（即大多数人的做法和大多数人的信念）。田野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呈现群体中典型行为或信念信息激活的社会规范对行为具有建构、解构和重构作用（Wesley-schultz, Nolan, Cialdini, Goldstein, & Griskevicius, 2007；Wesley-schultz, Nolan, Cialdini, Goldstein, & Griskevicius, 2018)。

Schwartz(1977)认为，亲社会行为暗含着基于个人价值体系的目的，所以在探讨情境变量对行为影响时不能不考虑个人价值和规范的差异。他指出，个人规范激活可以产生基于内在价值的道德义务感进而推动行为发生，而社会规范隐含的社会义务感压力会阻止激活内在义务感，它是通过外在社会压力推动行为。因此，由他人产生的社会压力只有当个体没有内化他们的观点、个人规范的形成不受他们的影响并认为他们可能会限制他的行动时，可增加由社会压力对行为的预测(Schwartz，1977)。对 Hines，Hungerford 和 Tomera(1987)发表环境行为元分析研究之后 20 年的亲环境行为的研究再次进行元分析发现，个人道德规范确实是预测行为倾向的三个重要变量之一，社会规范可通过行为控制感

知、态度和个人道德规范三个变量间接地预测亲环境行为倾向（Bamberg, & Möser , 2007）。针对马来西亚大学生节俭行为的研究结果表明，个人规范对行为变异具有显著解释作用，而社会规范缺乏显著的解释作用（Rizkalla, N. , Purnamaningsih, & Erhan, 2019）。环保主义社会运动研究发现，个人亲环境规范是支持运动目标的一般性社会心理变量，对环境运动非激进支持的三个维度（消费行为、环境公民及政策支持或接受）均具有解释作用（Stern, Dietz, Abel, Guagnano, & Kalof, 1999）。

可见，规范可以影响人们的亲社会行为，不论是个人层面的还是社会层面的。规范焦点理论认为（Cialdini, Reno, & Kallgren, 1990），在具体情境中，对特定行为具有推动作用的规范与情境诱发的注意聚焦有关。Cialdini, Kallgren 和 Reno(1991)研究（研究 9）表明，在多个规范线索信息共存条件下，被情境聚焦或凸显的规范约束人们的行为，甚至是规范冲突条件下也是如此。法律属于制度化的规则，来自于国家的制度体系，借助国家强制力来执行（郭春镇, & 马磊 , 2017）。这种制度化的客观规则，通过内化可直接形成个人规范（Morris, Hong, Chiu, & Liu, 2015），通过法律义务感约束人们的行为。在疫情期间，维护生命安全的防疫战疫是整个社会的主要目标。这一情境特点有利于将人们的注意力聚焦遵守隔离规定的个人规范，因此对遵守法律规定的他人行为社会评价可能更积极。

2 行为结果对他人行为评价的影响

对他人行为进行评价是我们解释和预测他人行为、作出应答的基础（McNamara, Willard, Norenzayan, & Henrich, 2019）。从认知角度来讲，当人们对他人行为进行评价和判断时不仅考虑行为者的行为倾向与意图，而且还考虑行为者行为所引起的结果。日常生活中我们对“好心办坏事”的个体往往不会过分指责；而对于“坏心办坏事”、“坏心办好事”的个体则持不同的看法。“好心”是指一个人的行为意图，而“坏事”则是行为结果。大量研究也发现，人们进行社会与道德评价时，对行为者的内在心理状态（如信念和愿望）、行为及行为结果都非常敏感（Cushman, 2015）。研究发现，4 岁儿童就可以将有帮助努力但帮助失败的行为判断为“好”；到 7 岁时就可以将有阻碍企图但阻碍失败的行为判断为“坏” （Margoni, & Surian, 2017），即对行为的“好”与

“坏”道德评价，有一个与年龄相关的由注重行为结果到行为倾向或意图的发展转变过程（Cushman, 2008）。而且，这种转变不仅局限于道德判断领域，在非直接互惠情境中（第三方立场）进行社会与道德判断及资源分配时，5 岁儿童比三岁儿童更关注行为者的倾向与意图（Li, & Tomasello, 2018）。这说明，人们对他人行为进行评价时，结果信息和意图信息的作用与个体认知能力发展密切相关。研究者们的解释是，幼儿时期整合心理信念和行为结果的能力相对于成人时期来说较弱，因此在行为意图和结果冲突情境下，幼儿更倾向把结果的好坏作为道德判断标准(Piaget, 1932/1965)；成年时期对于心理信念和行为结果的表达和整合能力得到提升，因此评价行为或事件时会综合考虑潜在意图和行为结果 (Wu, Hua, Yang, & Yin, 2018; Cushman, 2015； Cushman, Sheketoff, Wharton, & Carey, 2013)。Wu 等人(2018)针对成人被试研究发现，人们在帮助和伤害背景下的社会互动评价受行为倾向和结果共同作用。

同样在法律上定义犯罪时，人们也同时考虑犯罪人的行为后果和伤害企图(Hart, 1968)。研究显示对于同样后果，人们会认为有意图伤害比起无意图伤害造成的后果更加严重，即“危害放大”效应(Ames, & Fiske, 2013, 2015； Darley & Huff, 1990)。但是，也有研究表明某些特殊群体在道德评估上是以行为结果为导向，比如恐怖犯罪分子和精神病患者(Baez, Herrera, García, Manes, Young, & Ibáñez, 2017；McGuire, Brüne, & Langdon, 2017)。以恐怖犯罪分子为例，Baez 等人(2017)研究发现恐怖分子对违法行为的评价更注重结果，他们判断伤害未遂行为是根据行为结果是否成功而不是是否具有伤害他人意图。研究者的解释是，恐怖分子尤其是恐怖主义组织，他们认为自己所接受的思想或所追求的目标是符合道德的，那么他们更注重行为是否成功而不是根本意图。也就是说，除了个体认知成熟影响他人行为评价中结果和意图的作用外，个体所处的文化和特定的环境也会产生影响作用。已有研究也发现，行为意图和行为结果在他人行为评价中的作用存在文化差异。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群体更关注公共价值和人际关系，他们往往不太注重行为意图，更重视结果对集体的影响(Barrett, Bolyanatz, Crittendend, Fessler, Fitzpatrick, Gurven, et al., 2016；Laurin & Plaks, 2014)，尤其是当集体受到威胁，此时社会压力和群体凝聚力成为行为的决定因素，而意图起到的作用会很小，为了使行为更加有效，人们往往会选择可以直接观察的结果，而不会去推论其意图(McNamara, Willard, Norenzayan, & Henrich, 2019)。这意味着，在

我国文化背景下当法律规定和社会压力冲突时，行为者行为结果可能影响对遵守法律规定还是遵从社会压力行为选择的他人评价。

综上所述，疫情中的法律规定通过个体感知可转化成个人规范，以法律义务感驱动行为。当这一规范与来自社会压力的规范相冲突时，群体生命健康受到威胁以及我国集体主义文化关注社会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可能促使个体将注意聚焦到个体规范并使其凸显，成为聚焦规范。当人们对他人选择行为进行评价时，遵从这一聚焦规范的行为则被看成是“应该”的行为，为可接受的、不应该受到惩罚；反之，则为“不应该”的行为，不可接受的、应该受到惩罚的。“应该”或“不应该”本身包含着道德上的赞成或不赞成成分(Cialdini, Reno, & Kallgren, 1990)，因此此情境下他人行为评价应该与道德判断心理过程类似。研究发现，当一个活动可产生道德上有好有坏多个效应时，人们往往倾向于好效应优先原则(Levine, Mikhail, & Leslie, 2018)，也就是将可以获得好的效应作为活动者的行为倾向。由于疫情背景使个人规范凸显，在这一条件下，遵守个人规范、履行法律义务则在道德上是“好”的；而遵从社会压力则违背了个人规范，则在道德上是“坏”的。从这一角度来讲，在疫情背景下与遵从社会压力相比较，遵守法律规定的行为可能会更容易被接受、感知到的内心冲突更低、应给予行政惩罚更低，但因违背社会规范而人际关系可能遭到破坏，使亲子关系变得更差。同时研究发现，虽然文明社会中的人们对事件和行为进行他人评价时常常看重行为的倾向性与意图（Baez, Herrera, García, Manes, Young, & Ibáñez, 2017），但是行为结果与行为倾向性对评价具有共同作用（Wu, Hua, Yang, & Yin, 2018）。这意味着，在遵守法律和遵从社会压力行为选择的他人评价中，行为结果对评价也具有影响作用。据上述分析，针对疫情期间父母是否选择上报重点疫区归家儿子的选择行为他人评价研究中，可提出如下假设：1）相比于选择遵从社会压力行为，被试对选择遵守法律规定行为的接受度更高、感知选择时内心冲突更低、给予行政处罚更低，亲子关系变得更差；2）行为结果（发病传染他人、未发病未传染他人）对他人评价的影响受行为选择调节。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 G * power 3.1 软件按照效应量(ES $f = 0.25$)，显著性水平 $\alpha = 0.05$ 确定需要 210 名被试可达到 95%($1 - \beta$)统计检验力。本研究在 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期间（2020.2.28-2020.3.27）对隔离在家的大学生以“问卷星”数据收集为平台进行网络调查。共 290 名大学生自愿参与调查，其中男生 137 人(47.2%),，女生 153 人(52.8%)；年龄范围为 18 至 25 岁之间；居住地为城镇 164 人（56.6%），乡村 126 人（43.4%）。所有参与调查被随机分为 4 组，每组接受一种实验处理组合。

2. 2 实验设计

实验设计为 2(行为选择：法律，社会压力)×2(行为结果：发病传染他人，未发病未传染他人)完全被试间设计。因变量为行为选择他人评价，包括接受度、选择时内心冲突、给与行政处罚、疫情后亲子关系变化等评价。为了消除语句顺序效应，每种实验组合处理条件下，遵守法律规定和遵从社会压力的叙述语句顺序分为正序和倒序两种，将每组被试再随机分为两小组，每小组各接受一种叙述语句顺序处理。

2. 3 实验材料

采用疫情中父母是否上报重点疫区归家儿子事件为实验材料。实验材料包含以下信息：事件背景、故事主人公的行为倾向与选择、行为选择的结果（发病且传染他人、未发病且未传染他人）。具体内容如下：

故事背景信息：某年 S 市出现严重传染病疫情，主要传染方式是与病毒感染者（发病、未发病都具有传染性）接触。为了控制疫情，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到其他地区。政府发布了封锁 S 城命令，同时要求其他城市排查 S 市来人，并将他们安排到指定地点集中隔离（隔离期间保障他们的生活需求，但不能离开隔离房间）。在 S 城封城前一天，小 A 回到父母家中，父母家在另一个城市。之后，政府工作人员通过电话排查居民家中是否有 S 城来人。

行为倾向与选择：遵守法律规定，未遵从社会压力：小 A 父母亲接到电话时心里想：政府的通知规定应该遵守，而不要在乎人们会不会说他们无情无义。他们没有隐瞒、上报了家中有 S 城来人；未遵守法律规定，遵从社会压力：小 A 父母亲接到电话时心里想：政府的通知规定遵不遵守无所谓，而应该在乎人们会不会说他们无情无义。他们隐瞒、没有上报家中有 S 城来人。在具体叙述时，行为倾向（遵守法律规定和遵从社会压力）有正序和反序两种排列顺序，陈述语言不变。

行为选择结果：发病且传染他人：小 A 发病，家人和附近邻居也陆续有人被传染发病；未发病且未传染他人：小 A 没有发病，家人和附近邻居也一直没有人被传染发病。

事件陈述后，呈现四个针对事件中父母行为选择的评价问题，分别从行为接受程度、感受到心理冲突、亲子关系改变和给与行政处罚四个方面测量个体对行为选择的评价。**1）行为选择接受度评价：**针对小 A 父母亲隐瞒不报（或者没有隐瞒上报）行为，您能够接受的程度，按 1-非常不能接受到 7-非常能接受进行七点评分，得分越高说明评价者对事件中父母的行为选择接受度越高。**2）心理冲突评价：**上述事件中，您认为小 A 父母亲接到电话时心理感到，按 1-非常不矛盾到 7-非常矛盾进行七点评分，得分越高说明评价者认为事件中父母面临报告与不报告选择时感受到的心理矛盾越强烈；**3）亲子关系变化评价：**您认为疫情过后，父母亲和小 A 的亲子关系，按 1-比以前更差、2-维持原来状况、3-比以前更好进行三点评分，得分越高说明评价者给予父母选择的社会责罚越轻，事件中行为者遵从社会压力收益越大；**4）行政责罚评价：**疫情过后，根据相应的法律和治安条例，您认为应该给小 A 父母亲相应处罚吗？按 1-非常不应该到 5-非常应该进行五点评分，该题项为反向计分，得分越高则评价者给与行为者的的行政责罚越轻，事件中行为者遵守法律收益越大。

2. 4 数据处理

利用 SPSS 21.0 及其插件 Process，采用平均数差异 T 检验及双因素方差分析并采用 Bootstrap 进行 5000 次自抽样进行数据分析。将亲子关系、法律知识、信息获取途径、感知信息数量和感知信息质量等其他变量作为协变量，对数据进行初步分析后发现，其他变量对不同行为选择和行为结果的接受度评价、感知选择时内心冲突、亲子关系变化评价和给予行政处罚影响均未达到显著水平。因此，后续结果分析不再考虑这些变量的作用。

3 结果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和 Bootstrap 方法重复抽样 5000 次比较遵守法律规定和遵从社会压力行为选择的他人评价得分。结果发现，选择行为接受度评分存在显著差异（$t_{(288)}$=19.06，$p < 0.001$），效应值大小为 2.31(Cohen’s $d = 2.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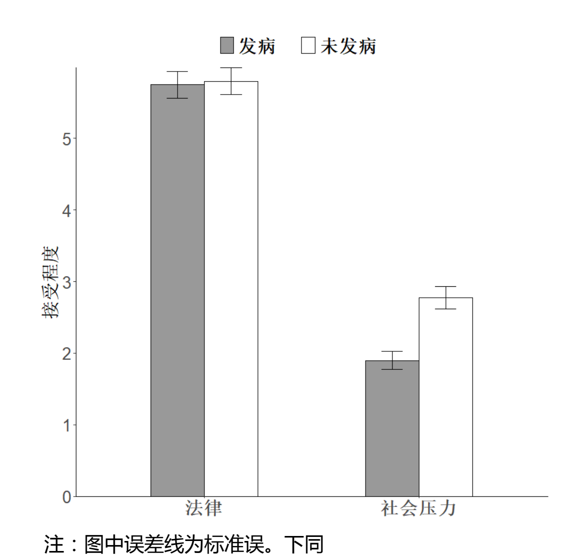
这表明遵守法律行为接受度的他人评分（$M_{法律}$ = 5.77，$SD_{法律}$ = 1.68；95%CI $_{法律}$[5.49, 6.03]）明显高于遵守社会压力行为接受度的他人评分（$M_{社会压力}$ = 2.39，$SD_{社会压力}$ = 1.27；95%CI $_{社会压力}$[2.18, 2.60]）；感知行为者面临选择时内心矛盾程度评分同样存在显著差异（$t_{(288)}$=-2.76，p = 0.006），效应值大小（Cohen's d = -0.33），这表明相比于遵从社会压力行为选择，评价者对遵守法律行为者面临选择时感知的内心冲突评分低（$M_{法律}$= 4.35，$SD_{法律}$= 1.50，95%$CI_{法律}$[4.10, 4.57]；$M_{社会压力}$ = 4.83，$SD_{社会压力}$=1.47，95%CI $_{社会压力}$[4.58, 5.07]）；针对责罚评分，亲子关系变化和给予行政处罚两方面，遵守法律和遵从社会压力行为选择两种条件下的差异均达到统计显著水平（$t_{(288)亲子关系}$=9.46，$p_{亲子关系}$< 0.001，Cohen's $d_{亲子关系}$= 1.13；$t_{(288)行政处罚}$=-15.97，$p_{行政处罚}$< 0.001，Cohen's $d_{行政处罚}$= -1.88），与遵从社会压力相比较，遵守法律行为的亲子关系在疫情前后变化评分更高（$M_{法律}$= 2.31，$SD_{法律}$= 0.53，95%CI $_{法律}$[2.23, 2.40]；$M_{社会压力}$ = 1.72，$SD_{社会压力}$=0.54，95%CI $_{社会压力}$[1.63, 1.81]）、给与行政处罚得分更低（$M_{法律}$= 2.07，$SD_{法律}$= 1.05，95%CI $_{法律}$[1.90, 2.24]；$M_{社会压力}$ =3.78，$SD_{社会压力}$=0.72，95%CI $_{社会压力}$[3.66, 3.90]）。以上结果表明，相对于遵从社会压力行为选择，遵守法律规定的行为选择他人评价更积极，也就是接受度更高、感知到行为者行为选择时内心冲突更小、亲子关系更好些、给予更少的行政处罚。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考察行为结果对他人评价的影响，结果发现在四个评价问题上均未达到统计显著性水平。采用 2(行为选择：法律，社会压力)×2(行为结果：发病传染他人，未发病未传染他人)两因素独立样本方差分析进一步考察行为选择和行为结果对社会评分是否存在交互作用，以探明行为结果对他人评价的影响是否因行为选择不同而存在差异。结果表明，对于接受度评价和亲子关系变化评价，行为选择和行为结果的交互作用显著（($F_{(1, 286)}$ = 5.51, p = 0.020, η^2 = 0.019；$F_{(1, 286)}$ = 9.00, p = 0.003, η^2 = 0.031）；对于感知行为选择时内心冲突评价和给与行政处罚评价，行为选择和行为结果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_{(1, 286)}$ = 0.38, p = 0.537, η^2 = 0.001；$F_{(1, 286)}$ = 0.25, p = 0.61, η^2 = 0.001）。采用 Bootstrap 方法重复抽样 5000 次，依据 Hayes(2018)模型 1 单一调节变量的主效应参数化（main effect parameterization）检验要求探查行为选择是否调节行为结果对他人评价影响。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行为选择对行为结果影响他人评价的调节作用

问题	模型				调节效应		
	R^2	MSE	$F_{(3,286)}$	p	ΔR^2	$F_{(1,286)}$	p
接受度	0.5749	2.20	128.92	<0.001	0.0082	5.51	0.020
亲子关系	0.2643	0.28	34.25	<0.001	0.0232	9.00	0.003
内心冲突	0.0270	2.22	2.65	0.049	0.0013	0.38	0.537
行政处罚	0.4750	0.83	86.25	<0.001	0.0005	0.25	0.614

对于接受度评价和亲子关系变化评价，行为结果的影响受行为选择调节作用达到显著水平，调节效应可解释因变量方差变异分别为 0.82%和 2.32%；对于感知选择时内心冲突评价和给予行政处罚评价，行为结果的影响受行为选择调节作用未达到显著水平。进一步分析不同行为选择条件下，行为结果对他人评价的影响。结果表明，对于违反法律规定、遵从社会压力行为，接受度评价和亲子关系变化评价受行为结果影响均达到显著水平（接受度评价：$\theta_{X\to Y} \mid (W=0.5)=0.88$，$t_{(286)}=3.39$，$p< 0.001$；亲子关系变化评价：$\theta_{X\to Y} \mid (W=0.5)=0.28$，$t_{(286)}=3.05$，$p=0.003$），相比于发病且传染家人邻居条件，结果未发病且未传染家人邻居条件下的行为接受度评价更高（$M_{发病}=1.90$，$M_{未发病}=2.77$）、亲子关系变好评价更高（$M_{发病}=1.56$，$M_{未发病}=1.84$）（见图 1 和图 2 所示）；而感知到选择时内心冲突评价和给予行政处罚评价受行为结果影响未达到显著水平（感知选择时内心冲突评价：$M_{发病}=4.76$，$M_{未发病}=4.88$，$\theta_{X\to Y} \mid (W=0.5)=0.12$，$t_{(286)}=0.45$，$p=0.651$；给予行政处罚：$M_{发病}=3.92$，$M_{未发病}=3.68$，$\theta_{X\to Y} \mid (W=0.5)=-0.24$，$t_{(286)}=-1.49$，$p=0.138$）；对于遵守法律规定、违反社会压力行为，行为结果对四个评价问题的影响均不显著（接受度评价：$M_{发病}=5.75$，$M_{未发病}=5.80$，$\theta_{X\to Y} \mid (W=-0.5)=0.05$，$t_{(286)}=0.21$，$p=0.835$；亲子关系变化评价：$M_{发病}=2.36$，$M_{未发病}=2.26$，$\theta_{X\to Y} \mid (W=-0.5)=-0.10$，$t_{(286)}=-1.12$，$p=0.264$；感知选择时内心冲突评价：$M_{发病}=4.39$，$M_{未发病}=4.29$，$\theta_{X\to Y} \mid (W=-0.5)=-0.10$，$t_{(286)}=-0.42$，$p=0.674$；给予行政处罚：$M_{发病}=2.13$，$M_{未发病}=2.00$，$\theta_{X\to Y} \mid (W=-0.5)=-0.13$，$t_{(286)}=-0.86$，$p=0.389$）。这一结果说明，行为选择对行为结果影响他人评价的调节效应应评价问题不同而存在差异。



注：图中误差线为标准误。下同

图 1 行为选择对行为结果影响接受度评价的调节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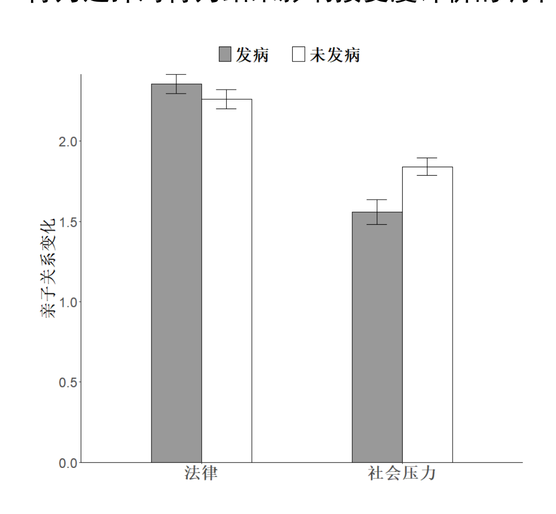


图 2 行为选择对行为结果影响亲子关系变化评价的调节效应

4 讨论

隔离是疫情爆发时阻隔病毒进一步传播、缓解和阻止疫情扩大的主要手段。然而，这一措施不仅影响普通大众日常生活与工作、学习，而且还影响他们的社会心理。因此，了解和掌握普通大众对这一措施的态度对掌握疫情期间的社会心理，团结人民群众共同抗疫战疫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在疫情期间，以法律规定和社会压力冲突情境中行为选择对刺激材料，从社会评价角度探讨人们对隔离措施的态度。结果发现，相比于遵从社会压力，人们对遵守法律规定的他人行为选择接受度更高、感受到他人选择时的心理冲突更低、给与更低的行政处罚，部分验证了假设；但假设未得到验证的是，亲子关系与事件发生前相

比变的更坏还是更好评价方面，则是遵守法律规定比遵从社会压力行为选择的评价得分更高。

规范整合模型（Morris, Hong, Chiu, & Liu, 2015）认为，特定的历史和环境背景下，存在着诸如规则、限制和制度化等各种维持社会秩序的客观规范，这些规范通过主观感受形成各种主观规范并进而影响人们的判断和行为。本研究的实验材料所呈现的社会事件中，重视血缘亲情的社会传统与重视人民生命安全的法律规定是冲突的，也就是如果选择遵守法律规定则意味着违反了社会传统；反之，如果选择遵从社会传统则意味着违反了法律规定。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肆虐全球范围、对大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的历史条件，可能将人们的注意更多地聚焦于能够避免健康和生命威胁法律规定所激发的主观规范，并使其凸显成为这一实验条件下的焦点规范。另外，研究发现我国属于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Oyserman, Coon, & Kemmelmeier, 2002），这一社会文化背景使人们更关注群体整体福祉（Brewer, & Chen, 2007），进而激活符合社会利益的规范，即本研究中的个人规范。因此，不论从规范聚焦理论还是价值激活理论来看，法律规定所产生的个人规范成为本实验条件下凸显规范。

研究发现，规范服从与遵从本身与文化价值取向有关（Murray, Trudeau, & Schaller, 2011）。我国传统儒家“角色伦理”文化价值尚德，将“家国”关系作为行为导向，强调在家庭和群体中成就所谓人与人“仁”关系的行为，以达到活得最有成就感；在处理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时，强调尽己所能的“忠”和行天下之大道的“义”（安乐哲，2017）。有关义务体验研究发现，相对于儒家传统文化背景下被试，西欧传统文化背景下被试对由义务感驱动的行为的社会评价比由主动感（agency）驱动的行为的评价更消极；采用日记和情境抽样研究进一步发现，相比于西欧被试，儒家文化背景下的被试行为的主动感和义务感所激发的动机的一致性更高，情绪与义务感所激发的动机的相关性更高（Buchtel, Ng, Norenzayan, Heine, Biesanz, & Chen, et al., 2018）。亲社会行为动机文化差异（日本，罗马尼亚，美国）研究同样发现，遵从儒家角色伦理文化的日本被试及高社区伦理赞同被试，实施善行的主动性动机和义务感动机间的关系及义务感动机与积极影响间的关系更紧密（Gherghel, Nastas, Hashimoto, Takai, & Cargile, 2019）。研究者们认为，与西方文化将社会期望和责任看成是

一种胁迫与压力、缺乏主动感不同，儒家责任取向文化对社会期望和责任的遵从是诚心诚意自愿的，不会导致胁迫感和缺乏主动感（Miller, Das, & Chakravarthy, 2011）。这意味着，被情境聚焦及集体主义价值取向激活而凸显的个人规范所产生的内在期望与限制，因我国儒家角色伦理文化使个体内化和整合了义务感形成自愿义务感（Buchtel, et al., 2018）而激发整合性个人规范动机（Thøgersen, 2006）并影响对他人行为评价，对于遵守法律要求行为评价更积极（如下图所示）。针对 COVID-19 爆发期间武汉市民的研究也发现，道德义务感对集体防疫战疫行为确实具有积极作用，且与干部领导的积极作用形成互促关系（Yang, & Ren, 2020）。也许，我国传统文化是政府应对 COVID-19 疫情做出正确决策后，能够凝聚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防疫战役并迅速控制疫情的法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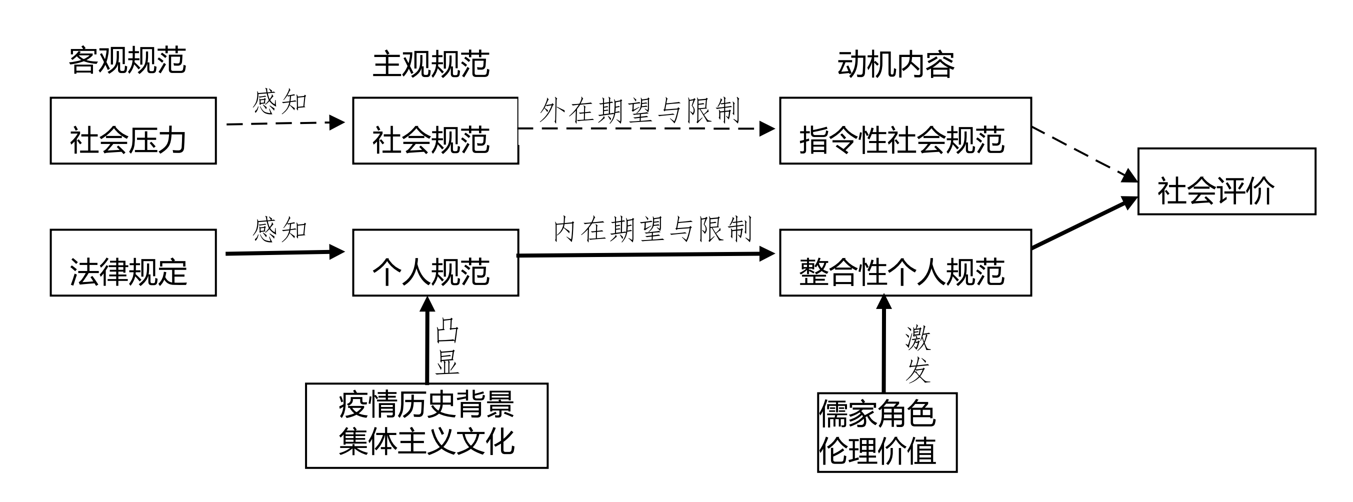


图 3　法律规定和社会压力冲突下行为选择评价

行为结果对他人行为评价（包括社会评价和道德评价）的影响效应一直备受关注。单一规则他人行为评价研究发现，事件和行为的结果是形成他人评价和判断的一个重要影响变量（Mulvey, Gnülta, & Richardson, 2020; McNamara, Willard, Norenzayan, & Henrich, 2019）。本研究发现，在疫情背景下，行为结果（发病并传染他人/未发病并未传染他人）对他人行为接受度和亲子关系变化评价的影响因遵守法律规定和遵从社会压力条件的不同而不同：在遵从社会压力条件下行为结果为未发病未传染情境下的接受度评价更高，亲子关系变化评价得分更高；而在遵守法律规定条件下，行为结果对两者的评价没有影响；但是行为结果对行为选择时的心理冲突感知评价和给与行政处罚评价的影响与遵

守法律规定还是遵从社会压力没有明显关系。这说明在规范冲突情境下，行为结果对他人评价的影响与所遵从规范是否为凸显规范有关，对于遵从凸显规范行为评价行为结果的影响作用不明显，对于违反凸显规范行为评价行为结果的影响因评价问题不同而不同。这可能与不同行为选择、不同评价问题所涉及的心理状态不同有关（Cushman, 2008）。Cushman（2015）认为，为了进一步社会互动，我们常常需要对互动对象进行道德品质、道德对错及责罚等评价，以调节自己和同伴行为。由于不同道德评价目的不同，因此在评价过程中所涉及的心理状态不同，影响因素也不同。道德品质评价是为了帮助我们判断应该信任谁、回避谁，所以主要受互动对象意图因素影响，即互动对象的行为意图是亲社会的还是反社会的；道德对错评价反映的是评价者对自身行为的调节，即“对我而言，什么行为是错的”，因此主要受互动对象行为本身影响；责罚评价主要依赖结果决定奖与惩以纠正他人行为，将“坏人”转变为“好人”（from harm-doers to do-gooders），因此不仅受行为意图和行为本身影响，也受结果影响。在本研究中，法律规定是凸显规范，且遵守法律规定在疫情发生时有益于社会，是一种亲社会行为，这样遵守法律规定行为的他人评价是一种道德品质评价，所以主要受行为意图影响，结果影响并不明显，因此四个评价问题均不受行为结果影响。对于遵从社会压力行为，因违反凸显规范而需要进行“错的评价”和行为责罚评价。行政处罚问题涉及评价标准违反凸显规范——法律与否，只要违反法律就是错的，与结果好坏无关；行为选择时心理冲突评价，是对行为选择本身对错所引发的心理状态评价，此时行为结果尚未发生，所以对于遵从社会压力行为的行政处罚和选择时心理冲突仅进行“错的评价”，因此受结果影响不明显。行为选择的接受度和亲子关系变化评价，结果可以对被评价者形成惩罚作用而纠正其产生危害性结果的行为，所以行为结果的好与坏是他人评价的一个重要变量，因此针对这两个问题的评价结果影响明显。从评价问题所涉及的心理状态角度解释行为结果对他人评价的影响作用，是否是行为结果影响作用的真实原因尚待进一步研究验证。

另外，本研究所获得的结果是基于以下几个条件获得的：1）研究环境背景是处在疫情爆发期；2）针对大学生这一受教育程度较高群体；3）实验材料是法律规定与他人评价社会压力冲突情境。未来研究可以更换研究对象群体和实

验材料情境进一步探讨遵从法律规定和社会压力行为的他人评价，并比较正常时期与疫情爆发期评价的差异，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5 结论

基于本研究条件，针对疫情期间对父母是否选择上报重点疫区归家儿子行为选择的他人评价的研究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相比于遵从社会压力选择行为，评价者对遵守法律规定选择行为的接受度更高、选择时感受到的心理冲突更低、给与的行政处罚更低，疫情后的亲子关系变得更好；

2）行为结果对评价影响受行为选择调节与评价问题有关，对接受度评价和亲子关系变化评价的影响显著受行为选择调节，而对感知选择时心理冲突评价和给予行政处罚评价的影响受行为选择调节不明显。

参考文献

安乐哲[美], 孟巍隆[美], (译). (2017). *儒家角色伦理学: 一套特色伦理学词汇*.,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75-228.

郭春镇, & 马磊. (2017). 对接法律的治理——美国社会规范理论述评及其中国意义. *国外社会科学*, (03), 113-124.

Ajzen, I. (1985). From intentions to actions: A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In J. Kuhl & J. Beckmann (Eds.), *Action-control: From cognition to behavior (pp. 11-39)*. Heidelberg: Springer.

Ajzen, I. (1991)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50*, 179-211.

Ames, D. L., & Fiske, S. T. (2013). Intentional harms are worse, even when they're not.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9), 1755-1762.

Ames, D. L. , & Fiske, S. T. . (2015). Perceived intent motivates people to magnify observed harm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2*(12), 3599-3605.

Baez, S. , Herrera, E. , García, A. M., Manes, F. , Young, L. , & Ibáñez, A. (2017). Outcome-oriented moral evaluation in terrorists.*Nature Human Behaviour, 1*, 0118.

Bamberg, S., & Möser, G. (2007). Twenty years after hines, hungerford, and tomera: a new meta-analysis of psycho-social determinants of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ur.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7*(1), 14-25.

Barrett, H. C., Bolyanatz, A., Crittendend, A. N., Fessler, D. M. T., Fitzpatrick, S., Gurven, M., et al. (2016). Small-scale societies exhibit fundamental variation in the role of intentions in moral judgment.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3*(17), 4688–4693.

Brewer, M. B., & Chen, Y. R. (2007). Where (who) are collectives in collectivism? toward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Psychological Review, 114*(1), 133-151.

Buchtel, E. E. , Ng, L. C. Y. , Norenzayan, A. , Heine, S. J. , Biesanz, J. C. , & Chen, S. X. , et al. (2018). A sense of obligation: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experience of oblig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4*(11) ,1-22.

Cialdini, R. B. Kallgren, C. A., & Reno, R, R. (1991). A focus theory of normative conduct: a theoretical refinement and reevaluation of the role of norms in human behavior.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4*(1), 201-234.

Cialdini, R. B. , Reno, R. R. , & Kallgren, C. A. (1990). A focus theory of normative conduct: Recycling the concept of norms to reduce littering in public plac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8*(6), 1015-1026.

Cushman, F. (2015). Deconstructing intent to reconstruct morality.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6*, 97-103.

Cushman, F. (2008). Crime and punishment: distinguishing the roles of causal and intentional analyses in moral judgment. *Cognition, 108*(2), 353-380.

Cushman, F., Sheketoff, R., Wharton, S., & Carey, S. (2013). The development of intent-based moral judgment. *Cognition, 127*, 6–21.

Darley, J. M., & Huff, C. W. (1990). Heightened damage assessment as a result of the intentionality of the damage-causing act.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9*, 181–188.

Gherghel, C. , Nastas, D. , Hashimoto, T. , Takai, J. , & Cargile, A. C. (2019). Culture, morality, and the effect of prosocial behavior motivation on positive affect. *Ethics & Behavior, 30*, 126-149.

Hart, H. L. A. (1968). *Punishment and Responsibi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yes, A. F. (2018).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2nd ed.). New York, NY: The Guilford Press, 267-301.

Hines, J. M., Hungerford, H. R., & Tomera, A. N. (1987). Analysis and synthesis of research on responsible environmental behaviour: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18*, 1–8.

Laurin, K., & Plaks, J. E. (2014). Religion and punishment: Opposing influences of orthopraxy and orthodoxy on reactions to unintentional act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5*(7), 835-843.

Levine, S., Mikhail, J., & Leslie A. M. (2018). Presumed innocent? How tacit assumptions of intentional structure shape moral judgmen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7*(11):1728-1747.

Li, J., & Tomasello, M. (2018). The development of intention-based sociomoral judgment and distribution behavior from a third-party stanc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167*, 78-92.

Margoni, F., & Surian, L. (2017). Children’s intention-based moral judgments of helping agents. *Cognitive Development, 41*, 46-64.

McGuire, J., Brüne, M., & Langdon, R. (2017). Outcome-focused judgements of moral dilemmas in schizophrenia. *Consciousness & Cognition*, *52*, 21-31.

McNamara, R. A., Willard, A. K., Norenzayan, A., & Henrich, J. (2019). Weighing outcome vs. intent across societies: how cultural models of mind shape moral reasoning. *Cognition, 182*, 95-108.

Miller, J. G. , Das, R. , & Chakravarthy, S. (2011). Culture and the role of choice in agenc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1*(1), 46-61.

Morris, M. W. , Hong, Y. Y. , Chiu, C. Y. , & Liu, Z. . (2015). Normology: integrating insights about social norms to understand cultural dynamic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29*, 1-13.

Mulvey, K. L., Gnülta, S., & Richardson, C. B. (2020). Who is to blame? children's and adults' moral judgments regarding victim and transgressor negligence. *Cognitive Science,44*, e12833.

Murray, D. R. , Trudeau, R. , & Schaller, M . (2011). On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conformity: four tests of the pathogen prevalence hypothesis.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7*(3), 318-329.

Oyserman, D., Coon, H. M. , & Kemmelmeier, M. (2002). Rethinking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evaluation of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and meta-analys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8*(1), 3-72.

Piaget, J. (1932/1965). *The moral judgment of the child*. New York: Free Press.

Rizkalla, N., Purnamaningsih, & Erhan, T. P. (2019). A study of curtailment behaviour in the context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indonesia: the role of values and norms.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Review, 4*(2): 135-146.

Steinmetz, H. , Knappstein, M. , Ajzen, I. , Schmidt, P., & Kabst. R., (2016). How effective are behavior change intervention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 Three-Level Meta-Analysis. *Zeitschrift Für Psychologie, 224*(3), 216-233.

Stern, P. C. , Dietz, T. , Abel, T. , Guagnano, G. A. , & Kalof, L. . (1999). Avalue belief norm theory of support for social movements: the case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 *Human Ecology Review, 6*(8), 1-97.
Schwartz, S. H. (1977). Normative Influences on Altruism. In L. Berkowitz(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10. pp. 221-279)*. New York, NY: Academic Press.
Thøgersen, J. (2006). Norms for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ur: an extended taxonomy.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6*(4), 247-261.
Wesley-schultz, P., Nolan, J. M., Cialdini, R. B., Goldstein, N. J., & Griskevicius, V. (2007). The constructive, destructive, and reconstructive power of social norm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8*(5), 429-434.
Wesley-schultz, P., Nolan, J. M., Cialdini, R. B., Goldstein, N. J., & Griskevicius, V. (2018). The constructive, destructive, and reconstructive power of social norms: Reprise. *Psychological Science, 18*(5), 429-434.
Wu, X. , Hua, R. , Yang, Z. , & Yin, J. (2018). The influence of intention and outcome on evaluations of social interaction. *Acta Psychologica, 182*, 75-81.
Yang, L. , & Ren, Y . (2020). Moral obligation, public leadership, and collective action for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vidence from the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emergen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7*(8), 2731.

What behavior is accepted more? The evaluation on conformist choice between isolation regulation and social pressure in disease prevalence

Abstract

Isol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relavant emergency laws is one of the key measures to coordinate collective action to prevent and control infectious diseases transmission when they occur. But the choice in conformity with isolation regulation is double-edged for the public. On one hand, it protects them from being infected and prevents the virus spread to others, so the choice can contribute to the whole society to well control disease. On the other hand, the choice may trap them into social pressure because of the conflict with the social convention in specail situation.

In order to explore what conformist behavior is more accepted in the dilemma where the isolation regulation and social convention are opposite, the study used an event as experimental task in which the parents chosed to report their son from the areas with severen epidmic to accept quarantine in conformity with regulation or social pressure. During the emergency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 a total of 290 undergraduates in china were recruited as free volunteers who wer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at random and each group was randomly assigned to one condition of 2 (conformist choice: isolation regulation, social pressure) × 2 (behavior outcome: ill and infecting others, not ill and not infecting others). They were asked to evaluate the conformist choice after reading the stroty on four questions: acceptability,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change, feeling of internal conflict and legal punish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comparing with the behavior following social pressure, the bahavior conformity with legal regulation was more accepted, felt less internal

conflict when the actor made the choice, was given less legal punishment and was better for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2) Conformist choice moderating the effect of behavior outcome on evaluation was varied for diffent questions, which is significant for the acceptability evalution and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change evalution and not for the evalutions of feeling of internal conflict and legal punishment.

The finding the actor`s choice what to comply with affects the evaluation can be explained that the background conditons of contagious disease and collectivistic culture enhance the salience of personal norms via the perception of regulation information and Confucian-heritage role ethics activates the willingly obliged motivation which is internalized into integrated personal norms to guide the evaluation. Mental states, choice and the outcome of those choice can structure many nuanced patters to response to different questions of evaluation. And this is likely why the moderation effect of conformist choice is varied when analyses how the outcome affects the evalution of different questions.

Key words complying with regulation; following social pressure; disease prevalence; othera` behavior evaluation; personal norms